

# 文化多样性与民间金融： 基于方言视角的经验研究

张 博 范辰辰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 本文利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衡量宏观层面民间金融繁荣程度, 以汉语方言多样性衡量文化多样性, 检验以方言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研究表明, 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作用机制在于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 有助于降低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进一步地, 我们使用山东省 438 家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表现衡量微观层面民间金融发展水平, 发现区域方言多样性降低了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贷款规模, 增加了信贷风险, 从而为文化多样性影响宏观层面民间金融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

**关键词:** 文化多样性; 方言; 民间金融; 小额贷款公司

**JEL 分类号:** G21, O16, Z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46(2018)07-0069-21

## 一、引 言

民间金融, 又称非正规金融(Informal Finance), 是指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其它金融活动, 主要包括私人借贷、商业信用以及小额贷款公司、合会、典当行等民间金融组织的资金借贷行为。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日趋活跃。1978 至 2008 年间, 民间金融市场贷款规模的年均增长率高达 17.8% (李建军 2010); 2013 年 22.3% 的中国家庭通过民间金融市场借款, 77% 的负债小微企业有民间融资, 民间金融市场规模约为

---

收稿日期: 2018-01-02

作者简介: 张 博(通讯作者) 经济学博士, 讲师,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 Email: blogzhang@hotmail.com.

范辰辰 经济学博士, 讲师, 山东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Email: fccsdufe@163.com.

\* 本文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133300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71703080)、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资助和特别资助(2017M612237、2018T110672)、山东大学基本科研业务费(2017GN004)的资助。感谢 2017 年中国青年经济学家联谊会、第十四届中国金融学年会、第三届文化与经济论坛、第六届全国博士后金融论坛与会人士的意见和建议。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5.28 万亿,比 2011 年的 4.47 万亿增加了 18%<sup>1</sup>。在正规金融部门存在信贷配给的背景下,民间金融市场不仅有助于提高家庭创业的可能性,而且能够满足那些被正规金融机构拒之门外的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从而推动小微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增长(Allen et al., 2005)。那么,为何民间金融市场在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复苏并迅速扩张?关于此问题,现有文献已从经济、制度和政府政策等方面进行了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水平、正规金融繁荣程度、社会资本以及地方政府政策是民间金融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钱水土和翁磊, 2009; 张翔 2010; 张雪春等 2013)。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探讨汉语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多样性在当代民间金融兴起过程中的作用及其机制。

现有研究发现,文化多样性不仅对技术传播(林建浩和赵子乐 2017)、人口流动(Adsera and Pytlikova 2015)、跨国贸易(施炳展 2016)、对外开放(李光勤等 2017)、经济增长(赵子乐和林建浩 2017)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且在风险投资公司的资产配置(Hegde and Tumlinson 2014)、公司跨国并购(Ahern et al. 2015)以及企业海外上市决策(Sarkissian and Schill 2003)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金融借贷交易而言,文化因素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Hahn(2014)和 Fisman et al(2017)发现借贷双方的文化相似性(Cultural Proximity)有助于增加银行的贷款规模,提高贷款质量并减少违约风险,因为文化相似性能够减少信息摩擦,降低交易成本。Giannetti and Yafeh(2012)和 Beck et al.(2017)认为银行的贷款规模、定价和贷款决策受到市场参与者之间文化距离(Culture Distance)的影响。

对于大多处于体制和政府监管框架之外的民间金融而言,由于法律、政府监管等正式制度的保障相对不足,汉语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在保障资金借贷、降低违约风险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比如,民间借贷契约大多遵从地域性“乡规”、“乡例”和“俗例”等文化习俗,并且依赖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的熟人关系保证契约执行(彭凯翔等 2008)。类似地,小额贷款公司对贷款对象进行调查走访主要依靠雇佣当地的信贷员,他们与贷款对象拥有相近的地域文化背景,使用同种方言进行交流沟通,有助于更加全面地掌握贷款对象的人品、信誉等“软信息”,并通过“乡音”的身份识别效应提高信任程度,从而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张龙耀等 2013)。

基于此,本文假设以多样方言衡量的地域文化多样性对民间金融发展具有负向影响。为检验此假设,我们以中国 276 个地级市行政区划和山东省 438 家小额贷款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利用各地市方言多样性衡量地域文化多样性,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检验其对小额贷款公司这一类重要民间金融组织发展程度的影响及其机制。基于徐现祥等(2015)整理的各地市方言多样性数据,我们以汉语次方言数量和基于人口规模构建的方言多样性指数,作为文化多样性的衡量。关于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程度,我们在宏观层面侧重分析各地市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资本额,微观层面主要关注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收益率、不良贷款率和贷款规模。

为了确定方言多样性在宏观层面对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的影响,我们控制了经

1 资料来自 2014 年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中国民间金融发展报告》和《中国小微企业发展报告》。

济发展水平、正规金融发展程度等一系列可能与二者同时相关的变量。OLS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对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资本额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汉语次方言数量每增加一个,每万平方公里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分别减少 0.074% 和 0.094%;这一结果在使用各地市河流长度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以及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的影响之后依然稳健。方言多样性影响民间金融发展的机制主要在于文化认同效应而非交流效应,即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进一步地,本文发现方言多样性在微观层面降低了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能力和贷款规模,增加了信贷风险,从而为方言多样性在宏观层面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提供了微观基础。

本文从以下几方面丰富了现有文献:第一,诸多经济社会变量被认为是影响民间金融发展的重要因素(姚耀军 2009),但尚未有文献考察以方言为代表的地域文化在民间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系统地检验了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影响,为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决定因素提供了基于文化视角的解释。第二,本文进一步丰富了语言及其背后的文化因素影响经济和金融行为的系列研究(刘毓芸等, 2015; 戴亦一等 2016; Fisman et al. 2017)。第三,本文为历史因素对当代金融市场发展的长期影响这一研究文献提供了基于中国民间金融市场的历史证据(Pascali 2016; Pierce and Snyder 2017)。第四,本文有助于丰富从文化等非正式制度的视角理解中国经济分割的相关研究(Falck et al. 2012; Chen et al. 2014)。

## 二、研究背景与假设

### (一) 中国民间金融的兴起

作为世界上最早产生货币和信用的国家之一,中国的民间金融活动有着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开始对旧有的金融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钱庄等民间金融机构或被清理转业,或被改组为公私合营银行。同时,政府设立了社会主义信用合作社,高息借贷、典当业等民间金融活动和组织均被取缔。直到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营企业的发展及其融资需求的日益增长,政府开始认可民间金融减轻银行信贷压力、优化资源配置的积极作用,并允许其适度发展,民间金融活动逐渐复苏。

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提供小额信贷为主要业务的小额贷款公司,逐渐兴起并成为一种制度化的民间金融组织形式(Tsai 2015)。之所以认为小额贷款公司属于民间金融的范畴,主要是因为小额贷款公司由地方政府主管部门(如金融工作办公室)而非金融监管部门(银保监会和证监会)监督管理,并且小额贷款公司经营信贷业务却并不持有金融牌照,因此类似于“影子银行”而游离于正规金融体制之外<sup>2</sup>。此外,作为当代民间金融的一

---

<sup>2</sup>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办发〔2013〕107号)中明确指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不持有金融牌照、存在监管不足的信用中介机构属于影子银行。

种主要组织形式,小额贷款公司发挥着引导民间资本合理投资的作用。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从 2010 年至 2016 年,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贷款余额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22.1% 和 29.4%,对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融资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尽管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发展迅速,民间金融却大多仍处于政策的灰色地带。自 1980 年代以来政府始终没有以法律或政策法规的形式明确对民间金融的监管。直到 2015 年 8 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务院法制办相继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和《非存款类放贷组织条例(征求意见稿)》,民间借贷和专业贷款机构的融资活动才开始有了法律上的认可,但仍未达到体制内金融所拥有的制度保障。

## (二) 汉语方言多样性及其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

中国地域广袤且历史悠久,自秦汉以来就开始对汉字进行统一书写,但汉语发音却依然“南腔北调”,形成了层次多元、种类繁多的汉语方言体系,主要包括北京官话、赣语等 17 种方言和 105 种次方言(许宝华和宫田一郎,1999)。尽管中国政府自建国以来一直大力推广普通话,但普通话的普及并未完全消除方言,而是形成了普通话与方言并行使用的双语现象。作为区域交流媒介,汉语方言为人际之间的沟通交流带来了一定的障碍,但不可否认的是,方言仍然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用。根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语文出版社,2006)的统计,全国能使用汉语方言进行交流的人口占比约为 86.38%,与家人交流时使用汉语方言的人口约占 82.15%。国家语委 2010 年的“普通话普及情况调查”同样发现,家庭的首要交际语言仍然是汉语方言,河北、江苏和广西三省区分别有 75.52%、83.45%、91.46% 的受访者在家庭最常讲方言,受访者儿时最先掌握的语言是方言的比重高达 81.45%、93.09%、94.66%。

汉语方言是地域文化的载体,一个地区的方言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存在着与生俱来的一致性(周振鹤和游汝杰,2015)。由于存在语音、声调、词汇、语法等方面的差异,多样的方言不仅带来语言交流上的障碍,更多的是区域文化差异性的体现(Licht et al., 2007)。一个可以观察的事实是,中国区域文化与汉语大类方言分类之间虽非一一对应,却呈现高度相关的关系(高翔和龙小宁,2016)。类似地,考古学中的山东龙山文化类型分布与现代山东方言的分区同样大体一致(钱曾怡和蔡凤书,2002)。民间风俗习惯等地域文化特征在各地方言中也处处可见。并且,语言因其背后的文化支撑,在历史发展和渐变过程中具有长期持续和稳定的特征(Tabellini, 2008)。以山东方言为例,其“两区四片”的格局自秦汉以来呈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和稳定性(吴永焕,2000)。对于具有典型“人格化”交易特征的民间金融活动而言,汉语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黄玖立和刘畅,2017),恰好为建立在信任基础之上的民间借贷提供了非正式制度支撑,在借贷契约的订立、执行以及风险防范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Karlan et al., 2009)。

一方面,汉语方言是社会变迁过程中历史文化的积淀,是绝大多数人的第一语言,其中蕴涵着与家乡水乳交融的乡土之情,至今依然是地域身份认同的重要标识(戴亦一等, 2014)。汉语方言背后的文化相似性与乡土情结相结合,使得拥有相同方言的群体往往会形成一个彼此情感依赖且兼具约束力和凝聚力的同乡圈层(翟学伟,2014)。换言之,

作为人际交往沟通的桥梁以及身份认同的重要维度,汉语方言会通过拉近人际交往中的心理距离,形成信任、社会网络等社会资本(黄玖立和刘畅,2017)。而民间金融活动正是依靠这种基于地缘和其它熟人关系的社会资本来获取资金需求方的信息,以缓解金融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林毅夫和孙希芳,2005)。拥有相同汉语方言的群体内部利用方言交流,使得出借人更容易了解借款人的信誉、人品等信息,并且相近的风俗习惯、道德规范等地域文化背景使得相互间的信任程度更高,有利于人际沟通合作并降低交易成本(Falek et al., 2012)。相反,方言差异所带来的文化多样性不仅阻碍了人际间的交流,形成了所谓的“人以群分”,而且可能造成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冲突,从而增加金融借贷中的沟通和交易成本,不利于民间借贷契约的订立及其风险防范。

另一方面,作为地域文化的载体,每种方言背后都蕴涵着特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Chen, 2013; 潘越等, 2017)。在多种方言并存的地区,使用同一种方言的群体内部不仅拥有易于接受的沟通方式,对彼此的历史文化和生活背景也有相近的认识和体会,并且拥有类似的风俗习惯、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比如,客家人遵循着“宁卖祖宗田,不卖祖宗言”的祖训,始终保持着客家固有的风土习俗,遍布全国的客家人彼此间也坚持使用客家话进行沟通交流。而民间借贷保障契约履行、防范违约风险的重要机制便在于道德伦理等文化机制和社会规范(彭凯翔等, 2008)。因此,多样方言代表的文化差异性,会导致人们在风俗习惯、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诸多差异,从而提高民间金融活动执行契约、防范违约风险的成本,阻碍民间借贷交易达成。即使借贷双方达成交易契约,由于文化道德约束在不同方言群体之间难以发挥作用,其隐含的违约风险也极易暴露。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各地广泛存在的同乡商会,商会成员通过“乡音”对彼此产生强烈的身份和文化认同,形成各种极具凝聚力的“圈子”,进而通过声誉机制和隐性担保机制形成独特的内部金融资源交换市场。类似地,在筛选贷款对象、评估贷款风险以及监督贷款使用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主要依靠雇佣当地的信贷员,他们与贷款对象拥有类似的地域文化背景,使用同种方言进行交流沟通,可以通过各种“关系”资本获取贷款对象的信息,并通过相同的道德文化和社会规范约束其行为,从而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张龙耀等, 2013)。根据2014年我们对山东省134家小额贷款公司的调查,小额贷款公司本地员工在总员工中的占比高达95.7%,总经理为本地人的小额贷款公司占全部样本的95.5%,其中有89%的小额贷款公司依赖熟人推荐来拓展贷款对象,2013年小额贷款公司发放的贷款中,保证贷款占76%,熟人贷款占比高达63%。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可检验假设: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地域文化多样性对民间金融发展具有负向影响,方言多样性较小的地区,其民间金融市场更为繁荣。

### 三、数据与变量

#### (一) 样本

在宏观层面,本文基于2016年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检验方言多样性

与民间金融发展程度之间的关系。自 2008 年试点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经过初期的高速发展,增速逐渐趋于稳定。小额贷款公司在试点初期的经营范围须限于本县(区)范围内,随着试点进程的深入,各省份相继放开其经营范围,扩展到本地市甚至本省范围之内。截至 2016 年底,全国绝大部分省份已出台相关政策规定允许小额贷款公司跨区经营或设立分支机构。在微观层面,我们利用山东省 2009—2015 年 438 家小额贷款公司的数据,考察方言多样性对民间金融机构经营表现的影响。选择山东作为研究样本的原因在于,作为中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大省和孔孟故里,山东省不仅拥有较为发达的民间金融市场,而且传统文化同样繁荣,深受齐鲁文化熏陶的山东人将方言视作随身携带的“名片”和地域文化象征。此外,我们获得了 2009—2015 年山东省全部小额贷款公司的详细经营数据,样本区间覆盖试点全过程。

## (二) 民间金融发展:小额贷款公司

在中国形式多样的民间金融活动中,本文侧重分析小额贷款公司这一当代民间金融主要形式的发展情况<sup>3</sup>。小额贷款公司试点自 2005 年起在山西、陕西、四川、贵州、内蒙古五省区率先实行,先后成立 7 家小额贷款公司;2008 年 5 月随着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银监发[2008]23 号)(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设立条件、资金来源、业务范围和监督管理等内容做出明确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试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中国人民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7 年底,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 8551 家,实收资本 8270.33 亿元,贷款余额 9799.49 亿元。

本文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是以各地市行政区划面积标准化之后的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即每万平方公里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sup>4</sup>。根据《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组织形式必须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尽管从事金融业务却并未持有金融许可证,国家有关部门也未按金融企业对其进行监管,但是全国所有经省级政府主管部门批准设立的小额贷款公司须在所在地工商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天眼查网站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网站查询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地址、成立时间、注册资本、股东资料等详细信息,基于此构建了中国小额贷款公司地级市层面的数据集。行政

<sup>3</sup> 需要说明的是,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仅衡量了一类从“灰色地带”走到“阳光下”的民间金融机构发展程度,并不足以衡量整个民间金融发展程度。民间金融机构还包括合会、典当行等,但其数据难以获取;自 2012 年开始试点的民间资本管理公司和民间融资登记服务公司两类新型民间融资机构发展时间较短,规模和影响相对有限。当然,在数据可得性受限的情况下,我们使用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也基本能够反映当前我国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的区域差异。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对此的提示。

<sup>4</sup> 本文之所以选择行政区划面积而不是人口规模进行标准化,是因为考虑人口是影响方言多样性的重要因素,并且人口密度同样与民间借贷密切相关,我们需要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以面积标准化之后的人口规模(即人口密度),以控制其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当然,中国幅员辽阔,东西部省份地级市行政区划面积存在的巨大差异可能导致作为被解释变量的民间金融发展出现衡量误差。为此,我们剔除一些行政区划面积比较大省份(新疆、内蒙古、青海、黑龙江)的地级市样本,检验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否依然稳健,发现基准回归结果并无显著的变化。限于篇幅,具体结果并未汇报,留存备案。

区划面积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 (三) 文化多样性: 方言多样性

在幅员辽阔且历史悠久的中国,多样的方言是特定地域范围内人们沟通的工具和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本文采用徐现祥等(2015)构建的方言数据库中方言多样性数据,作为地域文化多样性的衡量。该数据库以地级市行政区划作为分析单元,构建了两个衡量城市内部方言多样性的变量,一是该城市中所使用的汉语次方言(汉语方言片)数量;二是以某一城市中基于某种方言的人口比重进行加权平均的方言多样性指数。具体的变量构造方法参见徐现祥等(2015)。

### (四) 控制变量

1. 经济与正规金融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私营经济发展。地区经济发展和外部金融环境被认为是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等微型金融机构发展的首要因素(Ahlin et al., 2011),并且经济与金融繁荣程度同时可能是造成语言(方言)濒危的原因之一。因此,我们选取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正规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衡量经济与正规金融发展程度。另外,小额贷款公司设立的初衷是支持“三农”和小微企业发展,并且其主发起人须为管理规范、信用优良、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这就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受到当地产业结构和私营经济发展程度的影响。因此,我们在模型中加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以及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员数的比重。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2. 人口、民族与宗教。民间金融发展和方言多样性可能同时受到人口密度、民族构成和宗教文化的影响。首先,人口密度越大的地区,民间金融市场资金需求越旺盛,并且不同人群所使用的方言可能存在差异性。另外,中国是多民族聚居且宗教文化繁荣的国家,不同民族使用的语言及其文化习俗同样存在差异性,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当地的方言种类可能更加丰富。为了控制人口、民族和宗教因素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我们在方程中加入了人口密度、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佛教和道教活动场所数量以及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活动场所数量。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少数民族人口占比来源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宗教数据来源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信息中心提供的中国宗教数字地图。

3. 财政自给率、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对外开放程度。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由地方政府进行监管,因而有必要考虑地方政府的作用。为此,财政自给率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中。加入前者是因为地方政府财政自给率越低,其干预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信贷决策的动机越强,正规金融机构支持民营企业的力度可能越弱,从而间接地影响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姚耀军,2009);控制后者的原因在于民间金融市场可以为固定资产投资提供资金支持,固定资产投资较大的地区可能由于资金需求旺盛,催生出繁荣的民间金融市场。另外,由于人力资本是影响金融发展和方言多样性的重要因素,我们在控制变量中加入每万人在校大学生数量。小额贷款公司

的主发起人可能是外资企业,民间金融市场发展同样受到对外开放程度的影响。为此,我们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衡量该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数据来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

4. 移民、宗族与自然地理因素。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在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频繁。在人口净流入的城市,外来人口带来了外来方言和文化,方言和文化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并且移民还可能与民间金融发展之间存在联系。基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中的人口数据,我们构建了一个城市是否为人口净流入城市的虚拟变量,以控制人口迁徙的影响。作为中国农村最重要的社会网络之一,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对于民间借贷交易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郭云南等,2013)。同时,历史悠久的宗族制度可能同样与方言的形成密切相关。因此,我们利用“华人家谱总目:上海图书馆家谱知识服务平台”中公布的家谱信息,整理了各地市拥有家谱的数量,用以度量宗族制度的强弱。此外,自然地理因素也是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和方言多样性的重要变量。比如,平均坡度越高的地区往往更容易形成地理上的隔离,这可能在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中,阻碍不同方言片区的沟通,使得不同的汉语方言无法融合,表现出较高的方言多样性;另一方面,地理上的隔离也可能通过交通便利性阻碍民间金融市场的发展。因此,本文控制了平均坡度指数、距离海岸线的最近距离以及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三个自然地理变量,数据来源于 CHGIS(2007)。

#### (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1 汇报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到,中国每万平方公里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平均为 36.528 家和 39.704 元,并且区域发展差异明显,青海、西藏有些地市至今仍然没有设立小额贷款公司,而吉林长春、甘肃兰州等地市小额贷款公司机构家数高达 200 家左右。汉语方言片数量平均为 1.746 个,方言多样性指数均值为 0.316,方言片最多的城市多达 5 种,最少的地区仅有 1 种次方言,可见汉语方言确实颇具多样性。并且,汉语方言多样性同样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相比于北方,南方省份的方言多样性明显较大。

表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MFI/Area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数量	276	36.528	47.700	0.404	560.841
Capital/Area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资本	276	39.704	94.143	0.111	1365.859
No. Dialect	汉语方言片数量	276	1.746	0.804	1	5
Diversity	方言多样性指数	276	0.316	0.243	0.001	0.782
Ln(GDP per capita)	人均 GDP 对数	276	10.671	0.540	9.232	12.008
Ln(Density)	人口密度对数	276	0.045	0.050	0.0001	0.468
Structure2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73	0.456	0.102	0.148	0.714



续表						
变量	定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Structure3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	273	0.416	0.089	0.242	0.797
Selfsufficiency	财政自给率	276	0.462	0.225	0.080	1.038
Bankratio	银行贷款占 GDP 比重	276	1.038	0.719	0.310	8.950
ExportImport	进出口占 GDP 比重	276	0.161	0.257	0.001	0.980
Private	私营企业和个体就业占总就业人口比重	252	0.499	0.132	0.051	0.945
Fixedinvest	固定资产投资占 GDP 比重	276	0.897	0.333	0.186	2.199
Migration	是否人口净流入城市	276	0.373	0.485	0	1
Students	在校大学生数量( 每万人)	272	195.494	260.373	0	1293.690
Genealogy	家谱数量	260	258.039	360.902	2	1649
Buddtaom	佛教和道教活动场所数量( 每平方公里)	276	0.005	0.016	0	0.214
Chrisisla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场所数量( 每平方公里)	276	0.008	0.016	0	0.173
Minority	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276	10.756	19.980	0.040	96.672
Slope	平均坡度指数	276	2.531	2.149	0.050	13.368
Coastaldis	距离海岸线最近距离	276	4.698	5.791	0	33.297
Capitaldis	距离省会城市的距离	276	1.194	1.103	0	6.294

四、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影响

( 一) 实证方法和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在宏观层面系统地检验方言多样性是否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产生影响 ,我们选取 2016 年小额贷款公司的数量和资本额作为被解释变量 ,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进行基准回归 ,回归方程如下:

$$y_i = \beta_0 + \beta_1 Diversity_i + X_i \beta_2 + \varepsilon_i$$

( 1)

其中  $y_i$  为地级市  $i$  在 2016 年每万平方公里小额贷款公司数量或资本额;  $Diversity_i$  是地级市  $i$  的方言多样性变量 ,包括汉语次方言数量和方言多样性指数;  $X_i$  为控制变量;  $\varepsilon_i$  是随机扰动项。此外 ,我们还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省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区域发展政策等各省之间不同但省内相同或变化较小的影响民间金融市场发展的因素。

表 2 汇报了方程( 1) 的估计结果 ,其中第 1 - 4 列为方言多样性对 2016 年小额贷款公司数量的影响结果 ,而影响资本额的估计结果在第 5 - 8 列。从基准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 ,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的系数显著为负 ,这一结果在是否加入控

制变量之间保持稳健,表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明显受到方言多样性的负向影响。在第 3 列和第 7 列的 OLS 回归中,汉语次方言数量的系数分别为  $-0.074$  和  $-0.094$ ,意味着汉语次方言数量每增加一个,每万平方公里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分别减少  $0.074\%$  和  $0.094\%$ ,第 4 列和第 8 列的回归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指数的系数分别为  $-0.227$  和  $-0.355$ ,说明方言多样性指数每增加一单位,每万平方公里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分别减少  $0.227\%$  和  $0.355\%$ 。

表 2 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

变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资本			
	(1)	(2)	(3)	(4)	(5)	(6)	(7)	(8)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No. Dialect	$-0.124^{**}$ (0.060)		$-0.074^{**}$ (0.035)		$-0.151^{*}$ (0.077)		$-0.094^{**}$ (0.041)	
Diversity		$-1.037^{***}$ (0.223)		$-0.227^{*}$ (0.130)		$-1.840^{***}$ (0.276)		$-0.355^{**}$ (0.149)
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 Dummy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76	276	238	238	276	276	238	238
调整的 $R^2$	0.007	0.066	0.817	0.816	0.006	0.131	0.856	0.856

注:本表控制变量包括表 1 中所有的控制变量,为节省篇幅,控制变量估计结果未列出;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稳健标准差;部分样本某些变量缺失,因而缺失部分样本;\*\*\*、\*\*和 \* 分别代表在 1%、5% 和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以下各表同。

表 3 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工具变量法)

变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资本			
	(1)	(2)	(3)	(4)	(5)	(6)	(7)	(8)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No. Dialect	$-3.123^{***}$ (1.054)		$-0.437^{***}$ (0.147)		$-4.163^{***}$ (1.373)		$-0.240^{*}$ (0.143)	
Diversity		$-7.163^{***}$ (1.648)		$-2.590^{**}$ (1.116)		$-9.549^{***}$ (2.045)		$-1.424$ (0.901)
控制变量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 Dummy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不控制	不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76	276	238	238	276	276	238	238
调整的 $R^2$	0.386	0.720	0.984	0.972	0.199	0.516	0.847	0.819

续表								
变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资本			
	(1)	(2)	(3)	(4)	(5)	(6)	(7)	(8)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2SLS
工具变量一阶段回归结果:								
Ln(1 + Riverlength)	0.219*** (0.064)	0.095*** (0.019)	0.503*** (0.118)	0.085** (0.034)	0.219*** (0.064)	0.095*** (0.019)	0.503*** (0.118)	0.085** (0.034)
Cragg – Donald F – statistics	11.165	24.352	18.916	6.817	11.165	24.352	18.916	6.817

(二)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尽管基准回归模型中我们已经控制了诸多可能同时影响方言多样性和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因素,但 OLS 估计结果可能仍难以确定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因果关系。这主要是由于一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如历史上的民间文化习俗等,可能同时影响方言多样性和民间金融发展,从而造成对方言多样性估计系数的“遗漏变量偏差”。另一方面,同一汉语次方言内部在语音、声调等方面同样可能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的特征,基于汉语次方言数量构造的方言多样性指数本身存在“测量误差”,可能会低估方言多样性的影响。为处理上述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各地市河流长度这一“外生”变量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以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首先,河流山川造成的地理阻隔是形成多样方言的重要因素(詹伯慧 2001)。相比于平原地区,河流山川等地理阻隔较多的地区通常存在较大的方言歧异。民间自古就有“隔山不同语,过河非乡音”的说法,河流山脉越多的地区,其历史上越有可能被分割成不同的相对封闭的小区域,当地居民也随之被分割。在交通不便、河流山川阻隔的农业社会,被分割在河流两岸的居民交流相应地减少,久而久之可能会导致生活习俗、语言习惯的日趋分歧,从而形成方言的差异性。比如,吴方言和江淮方言的分界线大致就在长江下游,韩江下游则是粤东客话和潮汕闽语的分界。由此可见,河流长度与当地方言多样性密切相关。另一方面,随着现代交通和建筑技术的发展,自然形成的河流很难在交通便利程度大幅提高的现代社会直接影响民间金融的繁荣程度,因而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表 3 汇报了以河流长度作为工具变量的二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方言多样性的系数仍然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这一结果均保持稳健。汉语次方言数量对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437 和 -0.240(第 3 列和第 7 列),表明汉语次方言数量增加一个,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和资本额分别减少 0.437% 和 0.24%,从而验证了上述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2. 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

由于政治、经济、区位等方面的独特地位,直辖市、省会城市以及计划单列市相比于其

他城市可能享有诸多政策上的特惠优势<sup>5</sup>。并且,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也是人口净流入较多的城市。因此,为了排除上述城市可能存在的政策优势以及人口迁徙的影响,我们使用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之后的样本重新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仅剔除直辖市还是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依然成立<sup>6</sup>。

### (三) 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机制:文化认同或交流效应

既然方言多样性确实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从理论上分析,由于语言兼具文化认同(身份识别)和人际沟通的功能(Guiso et al., 2009),方言多样性可能主要通过两种机制影响民间金融市场发展:一是交流效应,即纯粹因为语言不通产生的交流障碍使得借贷双方难以达成借贷契约,在汉语方言体系中,不同地域的方言、甚至同一方言内部均存在明显的差异,尤其是南方地区的方言,经常“十里不同音”;二是文化认同效应,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对于民间借贷交易的契约订立与执行具有积极作用,多样方言所代表的文化差异性可能通过增加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对其产生不利影响。

那么,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消极作用到底是源于交流效应还是文化认同效应?我们尝试通过以下思路进行检验:方言与普通话相似程度越高的地区或者该地区属于官话地区,人际之间交流沟通的障碍相对较小,如果方言多样性作用于民间金融市场的机制在于方言本身的交流功能,那么对于与普通话相似程度越高的地区或者官话地区,方言多样性对民间金融发展的消极作用应该更小;反之,如果方言的文化认同效应是主要作用机制,则方言多样性对于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在官话和非官话地区、与普通话相似程度不同的地区之间应该不会存在显著差异。为此,我们在回归方程(1)中加入该地是否属于官话地区的虚拟变量和该地市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似程度变量,以及二者与方言多样性变量的交互项,检验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作用会不会受到该地是否属于官话地区和方言与普通话相似程度的影响。其中,某地市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似程度用该地市方言与北京方言的相似程度衡量,该变量的取值范围是 0-3,取值越小表示该地市方言与普通话的相似程度越高;是否属于官话地区是二值虚拟变量,该城市属于官话地区为 1,非官话地区为 0。数据分别来源于刘毓芸等(2015)和徐现祥等(2015)。

5 直辖市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计划单列市包括大连、青岛、宁波、厦门、深圳。

6 篇幅所限,本文并未汇报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省会城市样本的回归结果,留存备索。

表 4 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交流效应

变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小贷公司资本			
	(1)	(2)	(3)	(4)	(5)	(6)	(7)	(8)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Panel A 与普通话的相似度								
No. Dialect	-0.081** (0.038)		-0.080** (0.040)		-0.101** (0.044)		-0.092* (0.047)	
No. Dialect × PuthSim			-0.005 (0.077)				-0.066 (0.085)	
Diversity		-0.247* (0.134)		-0.231* (0.137)		-0.353** (0.154)		-0.348** (0.158)
Diversity × PuthSim				-0.198 (0.255)				-0.056 (0.284)
PuthSim	0.077 (0.103)	0.065 (0.105)	0.086 (0.181)	0.117 (0.134)	-0.040 (0.127)	-0.055 (0.128)	0.081 (0.218)	-0.040 (0.16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 Dumm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210
调整的 R <sup>2</sup>	0.835	0.833	0.834	0.832	0.868	0.868	0.868	0.867
Panel B 是否官话地区								
No. Dialect	-0.074** (0.035)		-0.069 (0.052)		-0.094** (0.041)		-0.111* (0.060)	
No. Dialect × Guanhua			-0.008 (0.064)				0.026 (0.077)	
Diversity		-0.228* (0.130)		-0.286 (0.196)		-0.356** (0.150)		-0.254 (0.241)
Diversity × Guanhua				0.090 (0.257)				-0.157 (0.308)
Guanhua	-0.113 (0.101)	-0.109 (0.100)	-0.096 (0.176)	-0.136 (0.137)	-0.072 (0.141)	-0.068 (0.140)	-0.123 (0.225)	-0.022 (0.170)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 Dumm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238
调整的 R <sup>2</sup>	0.818	0.816	0.817	0.815	0.855	0.856	0.855	0.855

表 5 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文化认同效应

变量	每万平方公里 小贷公司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 小贷公司资本		每万平方公里 小贷公司数量		每万平方公里 小贷公司资本	
	(1)	(2)	(3)	(4)	(5)	(6)	(7)	(8)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OLS
No. Dialect	-0.146 ** (0.062)		-0.130 * (0.073)		0.003 (0.073)		0.039 (0.093)	
Diversity		-0.134 (0.246)		-0.154 (0.288)		0.126 (0.268)		0.030 (0.334)
No. Dialect × Trust	-0.216 ** (0.101)		-0.214 (0.130)					
Diversity × Trust		-0.460 (0.289)		-0.291 (0.322)				
No. Dialect × Trust Dummy					-0.312 ** (0.119)		-0.332 ** (0.140)	
Diversity × Trust Dummy						-0.749 * (0.392)		-0.466 (0.448)
Trust	0.350 * (0.186)	0.081 (0.107)	0.343 (0.214)	0.041 (0.122)				
Trust Dummy					0.581 ** (0.225)	0.224 (0.150)	0.556 ** (0.256)	0.091 (0.157)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Prov Dummy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83	83	83	83	83	83	83	83
调整的 R <sup>2</sup>	0.903	0.885	0.909	0.898	0.909	0.887	0.913	0.899

表 4 中 Panel A 和 Panel B 分别汇报了加入方言与普通话相似程度以及是否官话地区的估计结果,第 1-4 列和第 5-8 列分别为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额作为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 Panel A 中,加入方言与普通话相似程度变量的估计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并不显著,但方言多样性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第 1-2 列和第 5-6 列),进一步加入二者的交互项可以发现,交互项系数在 10% 的水平上同样不显著(第 3-4 列和第 7-8 列),意味着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作用不会受到当地方言与普通话相似程度的影响。类似地,Panel B 中列示的结果显示,不论对于小额贷款公司数量还是资本额,单独加入是否官话地区变量,方言多样性变量的系数依然显著为负,二者交互项的系数则并不显著,方言多样性对于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在官话和非官话地区不存在明显的差异,说明方言多样性影响民间金融发展的机制可能并非语言不通造成的交流障碍。

为了进一步确认方言多样性影响民间金融发展的文化认同效应,我们利用 2005 年中

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中居民调查提供的社会信任数据构造了衡量各地市平均社会信任水平的变量。在CGSS调查问卷中涉及信任的问题具体如下:在不直接涉及金钱利益的一般社会交往/接触中,您觉得下列人士中可以信任的人多不多呢?其中包括(近)邻居、远邻/街坊或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同村的同姓人士、同村的非同姓人士、亲戚、同事、交情不深的朋友/相识、老同学、在外地相遇的同乡、一起参加文娱等业余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宗教活动的人士、一起参加社会活动/公益活动的人士、陌生人。每个选项赋值不同,“绝大多数不可信”、“多数不可信”、“可信与不可信者各半”、“多数可信”、“绝大多数可信”、“不适用”分别赋值为1-6。

本文主要关注汉语方言体现的同乡信任,我们选取对(近)邻居、远邻/街坊或邻居以外的同村居民、同村的同姓人士、同村的非同姓人士以及在外地相遇的同乡的信任,并将个体居民层面信任变量的平均值作为地区信任水平的衡量,变量取值越大,意味着该地区平均社会信任水平越高。进一步地,我们将该变量按照其中位数分为两组并构造了度量地区信任水平的虚拟变量,取值为1(地区信任水平变量取值大于等于中位数)是社会信任水平较高的地区,取值为0(地区信任水平变量取值小于中位数)为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地区。对于传统中国社会而言,方言认同有助于形成社会信任(李涛等,2008),并且方言对社会信任的影响确实是通过族群或来源地身份识别来实现的(黄玖立和刘畅,2017)。因此,地缘(同乡)认同可能是方言的身份认同效应影响信任形成的机制之一。由于难以获取合适的变量来衡量方言认同,我们只能以同乡信任作为替代变量,进行文化(信任)机制的检验。我们在回归方程(1)中加入上述两个衡量社会信任水平的变量及其与方言多样性变量的交互项,表5汇报的估计结果显示,方言多样性与社会信任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社会信任水平越高的地区,方言多样性对民间金融发展的消极作用越大。以上结果表明,方言多样性影响民间金融发展的机制主要在于文化认同效应而非交流效应,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大力推广普及的普通话在人们的日常交流沟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即使双方的方言存在较大差异,也基本可以使用普通话进行交流,但是普通话的推广仅畅通了人们的日常沟通,却并不能完全消除方言所体现的乡土文化观念以及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高翔和龙小宁,2016),方言背后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才是民间金融活动的非正式制度基础。

## 五、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表现的影响

### (一) 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表现的影响

为了检验方言多样性在微观层面对小额贷款公司这类民间金融机构经营表现的影响,以期第四部分宏观层面的作用提供微观基础,本文接下来以山东省2009-2015年438家小额贷款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从盈利能力、信贷风险和贷款规模三个方面衡量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表现,探讨方言多样性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利用小额贷款公司的资产收益率(ROA)和不良贷款率作为盈利能力和信贷风险的衡量,以累计贷

款额和平均贷款额度衡量其贷款规模,以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市的方言多样性作为主要解释变量,同时在回归方程中加入了一系列小额贷款公司层面和县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其中,小额贷款公司层面的变量包括经营时间、资产总额、负债权益比率、长期贷款占总贷款比例、公司董事会人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法人股东持股比例、国有资本占总资本比例;县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县区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人口规模、出口总额占 GDP 比重。2010 年每万人中银行营业网点数量、每万人在校中小學生数量、是否“蓝黄”两区、平均坡度指数、距离海岸线的最近距离。数据来自山东省小额贷款企业协会、历年《山东统计年鉴》和各地市统计年鉴。

由于方言多样性是地市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变量,我们使用混合回归(Pooled Regression Model)和面板数据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进行估计。表 6 中 Panel A 第 1-4 列和第 5-8 列分别汇报了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资产收益率和不良贷款率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第 1-4 列中汉语次方言数量和方言多样性指标的系数均在 5% 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一结果在不同估计方法之间保持稳健,表明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盈利能力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不良贷款率而言,方言多样性的系数则显著为正,意味着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风险随着方言多样性程度的提高而增加。之所以如此,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民间金融依赖文化和社会资本这种契约执行机制的有效性存在局限,民间金融活动的范围受到社会网络有效范围的影响,一旦超过关系网络的边界,合约执行的保障机制就会缺失,即使不超过社会网络,网络规模的扩大和成员间社会关系的疏离也会降低信息质量和威胁的可置信性(Greif,1994)。随着方言多样性的增加,文化相似性逐渐降低,小额贷款公司与贷款对象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随之增大,超过一定的边界就会导致违约风险增加。表 6 中 Panel B 汇报的方言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信贷规模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对于累计贷款额或是平均贷款额,方言多样性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说明在方言多样性越大的地区,较低的地域文化认同会降低借贷双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当地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规模越小。

表 6 方言多样性影响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盈利能力、风险和信贷规模

	(1)	(2)	(3)	(4)	(5)	(6)	(7)	(8)
	OLS	OLS	RE	RE	OLS	OLS	RE	RE
Panel A								
被解释变量	资产收益率(ROA)				不良贷款率			
No. Dialect	-0.804** (0.372)		-0.879** (0.352)		0.006** (0.003)		0.006** (0.003)	
Diversity		-2.678** (1.254)		-2.872** (1.213)		0.026** (0.011)		0.027** (0.011)



续表								
	(1)	(2)	(3)	(4)	(5)	(6)	(7)	(8)
	OLS	OLS	RE	RE	OLS	OLS	RE	RE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747	1 747	1 747	1 747	1 747	1 747	1 747	1 747
调整的 R <sup>2</sup>	0.213	0.213	0.222	0.222	0.119	0.121	0.130	0.132
Panel B								
被解释变量	累计贷款额				平均每笔贷款金额			
No. Dialect	-0.123 (0.079)		-0.111 (0.082)		-0.086** (0.035)		-0.096** (0.039)	
Diversity		-0.864*** (0.307)		-0.791** (0.335)		-0.585*** (0.112)		-0.570*** (0.12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Year F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 747	1 747	1 747	1 747	1 711	1 711	1 711	1 711
调整的 R <sup>2</sup>	0.223	0.227	0.231	0.236	0.344	0.362	0.335	0.352

注: 本表的控制变量包括正文中所述的所有小额贷款公司层面和县层面变量,篇幅所限,控制变量的系数未列出。

(二) 安慰剂检验: 方言多样性对 P2P 网贷机构经营表现的影响

为了缓解上述回归中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偏差,并进一步确认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影响,我们利用山东省 2016 年正常经营的 100 家 P2P 网络借贷机构的经营数据进行安慰剂检验(Placebo Test)。P2P 网络借贷是民间借贷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的一种金融创新模式(王会娟和廖理,2014),其与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模式和发展历程存在诸多类似之处。首先,P2P 网络借贷机构属于游离于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民间金融机构,法律和政府监管等正式制度的保障相对不足;其次,P2P 网贷平台于 2007 年在中国出现之后经历了数年的高速发展时期,随着近年政府规范监管的加强以及政策调整,进入了平稳发展时期,这与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轨迹非常相似;最后,与小额贷款公司类似,P2P 网贷平台经营借贷业务同样以信用贷款为主,通常不需要抵押品,并且由于信息、交易成本等方面的优势,P2P 网贷平台的借贷双方均存在明显的本地倾向(Lin and Viswanathan, 2015)。特别是对于在山东省运营的 P2P 网贷平台而言,由于规模和知名度相对有限且问题平台数量较多,借贷双方主要以本地客户为主。但是,与小额贷款公司不同的是,P2P 网络借贷是出借人与借款人通过互联网平台进行资金借贷业务,而并非通过信贷员(出借人)调查筛选客户(借款人)进而审批发放贷款。换言之,在 P2P 网贷平台的信贷业务经营过程中,无须通过出借人与借款人之间的面对面直接交流沟通。因此,我们可以利用 P2P 网贷机构数据确定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影响并非由其他遗漏变量引起。P2P 网贷数据来源于本课题组 2017 年 1-2 月对山东省 P2P 网贷机构的问卷调查,

本次调查向山东省 2016 年正常经营的 P2P 机构发放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 P2P 机构名称、所在县区、资本、经营时间、借款余额、借款人数、出借人数、平均借款额度和期限、借款利率、逾期金额等,调查范围涉及山东省 17 个地市,共获得有效样本 100 个。研究发现,不同于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的影响,无论是使用贷款余额、借款人数、出借人数还是逾期率衡量 P2P 网贷机构的贷款规模和信贷风险,方言多样性变量的系数均不显著或不稳健,表明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地域文化多样性对 P2P 这种借助互联网技术经营信贷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的经营表现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也就说明上述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表现的影响并非由其他遗漏变量引起,从而验证了汉语方言所体现的文化多样性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经营结论的稳健性<sup>7</sup>。

##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 2016 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小额贷款公司和汉语方言多样性数据,检验以方言多样性衡量的地域文化多样性对民间金融发展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表明,方言多样性在宏观层面对小额贷款公司数量和资本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在使用河流长度作为方言多样性的工具变量以及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和省会城市进行回归之后依然保持稳健;其作用机制主要在于文化认同效应而非交流效应,即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有助于降低民间借贷的交易成本和违约风险。进一步地,本文使用山东省小额贷款公司层面的微观数据,考察方言多样性对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表现的影响,发现方言多样性对其盈利能力和贷款规模具有消极作用,但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信贷风险,从而为方言多样性在宏观层面对小额贷款公司发展的影响提供了微观基础。

本文的结论对于当前中国的民间金融改革及其风险防控具有政策启示意义。首先,方言所体现的地域文化和身份认同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资本是民间金融的重要载体和运行基础,因而推动民间金融市场发展、防控民间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之一是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金融机构的文化建设、内部治理和行业自律。其次,民间金融活动依赖熟人关系和道德伦理保障契约执行的机制存在局限性,民间金融发展内生地要求引入政府监管和法律治理等正式制度。因此,应根据现实情况进一步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和监管体系,特别是应该加强对 P2P 网络借贷等超出特定区域和文化范围的民间金融活动的监管力度。最后,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应结合区域文化特征制定适合当地市场环境的监管标准和方式,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实现正式监管体系与文化约束的协调一致。

7 篇幅所限,本文并未汇报方言多样性影响 P2P 网贷平台经营表现的估计结果,留存备索。

## 参考文献

- [1]戴亦一、肖金利和潘越 2016,《“乡音”能否降低公司代理成本——基于方言视角的研究》,《经济研究》第12期,第147~160页。
- [2]高翔和龙小宁 2016,《省级行政区划造成的文化分割会影响区域经济吗》,《经济学(季刊)》第15卷第2期,第647~674页。
- [3]郭云南、张琳弋和姚洋 2013,《宗族网络,融资与农民自主创业》,《金融研究》第9期,第136~149页。
- [4]黄玖立和刘畅 2017,《方言与社会信任》,《财经研究》第7期,第83~94页。
- [5]李光勤、曹建华和邵帅 2017,《语言多样性与中国对外开放的地区差异》,《世界经济》第3期,第144~168页。
- [6]李建军 2010,《中国未观测信贷规模的变化: 1978~2008年》,《金融研究》第4期,第40~49页。
- [7]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和周开国 2008,《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 ——来自广东省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1期,第137~152页。
- [8]林毅夫和孙希芳 2005,《信息、非正规金融与中小企业融资》,《经济研究》第7期,第35~44页。
- [9]林建浩和赵子乐 2017,《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 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经济研究》第10期,第182~197页。
- [10]刘毓芸、徐现祥和肖泽凯 2015,《劳动力跨方言流动的倒U型模式》,《经济研究》第10期,第134~146页。
- [11]彭凯翔、陈志武和袁为鹏 2008,《近代中国农村借贷市场的机制——基于民间文书的研究》,《经济研究》第5期,第147~159页。
- [12]钱水土和翁磊 2009,《社会资本,非正规金融与产业集群发展——浙江经验研究》,《金融研究》第11期,第194~206页。
- [13]钱曾怡和蔡凤书 2002,《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与山东方言分区》,《中国语文》第2期,第142~148页。
- [14]施炳展 2016,《文化认同与国际贸易》,《世界经济》第5期,第78~97页。
- [15]王会娟和廖理 2014,《中国P2P网络借贷平台信用认证机制研究——来自“人人贷”的经验证据》,《中国工业经济》第4期,第136~147页。
- [16]吴永煊 2000,《从〈方言〉所记地名看山东方言的分区》,《文史哲》第6期,第66~71页。
- [17]徐现祥、刘毓芸和肖泽凯 2015,《方言与经济增长》,《经济学报》第2卷第2期,第1~32页。
- [18]许宝华和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中华书局,1999年。
- [19]姚耀军 2009,《非正规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经济增长效应》,《财经研究》第12期,第129~139页。
- [20]詹伯慧,《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
- [21]张雪春、徐忠和秦朵 2013,《民间借贷利率与民间资本的出路: 温州案例》,《金融研究》第3期,第1~14页。
- [22]张翔 2010,《以政府信用为信号——改革后温州地区民营存款类金融机构的信息机制》,《社会学研究》第6期,第116~148页。
- [23]张龙耀、陈畅和刘俊杰 2013,《社会资本与小额信贷风险控制: 理论机制与实证检验》,《经济学动态》第2期,第73~77页。
- [24]翟学伟 2014,《信任的本质及其文化》,《社会》第34卷第1期,第1~26页。
- [25]赵子乐和林建浩 2017,《经济发展差距的文化假说: 从基因到语言》,《管理世界》第1期,第65~77页。
- [26]Allen, F., J. Qian, and M. Qian, 2005,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77(1), 57~116.
- [27]Ahern, K., D. Daminelli, C. Fracassi, 2015, “Lost in Translation? The Effect of Cultural Values on Mergers around the World”,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Vol. 117(1), 165~189.
- [28]Ahlin, C., J. Lin, and M. Maio, 2011, “Where Does Microfinance Flourish?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 Performance in Macroeconomic Context”,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95(2), 105~120.

- [29] Adsera , A , and M. Pytlikova , 2015 , “The Role of Language in Shap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 *The Economic Journal* , Vol. 125( 586) , F49 ~ F81.
- [30] Beck , T. , V. Ioannidou , L. Schäfer , 2017 , “Foreigners vs. Natives: Bank Lending Technologies and Loan Pricing” , *Management Science* , Forthcoming.
- [31] Chen , Z , M. Lu , L. Xu , 2014 , “Returns to Dialect: Identity Exposure through Language in the Chinese Labor Market” , *China Economic Review* , Vol. 30 , 27 ~ 43.
- [32] Falck , O , S. Heblich , A. Lameli , J. Südekum , 2012 , “Dialects , Cultural Identity , and Economic Exchange” ,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 Vol. 72( 2) , 225 ~ 239.
- [33] Fisman , R , D. Paravisini , V. Vig , 2017 , “Cultural Proximity and Loan Outcomes”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 Vol. 107( 2) , 457 ~ 492.
- [34] Giannetti , M. and Y. Yafeh , 2012 , “Do Cultural Differences Between Contracting Parties Matter? Evidence from Syndicated Bank Loans” , *Management Science* , Vol. 58( 2) , 365 ~ 383.
- [35] Greif , A. , 1994 , “Cultural Belief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ist Societies” ,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 Vol. 102( 5) , 912 ~ 950.
- [36] Guiso , L. , P. Sapienza , L. Zingales , 2009 , “Cultural Biases in Economic Exchange?”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124( 3) , 1095 ~ 1131.
- [37] Hahn , F. , 2014 , “Culture ,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Small – scale Banking” , *The Economic Journal* , Vol. 124( 577) , 859 ~ 886.
- [38] Hegde , D. and J. Tumlinson , 2014 , “Does Social Proximity Enhance Business Partnerships? 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Ethnicity’s Role in US Venture Capital” , *Management Science* , Vol. 60( 9) , 2355 ~ 2380.
- [39] Karlan , D. , M. Mobius , T. Rosenblat , and A. Szeidl , 2009 , “Trust and Social Collateral”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 Vol. 124( 3) , 1307 ~ 1361.
- [40] Licht , A. , C. Goldschmidt , S. Schwartz , 2007 , “Culture Rules: The Foundations of the Rule of Law and other Norms of Governance” ,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 Vol. 35( 4) , 659 ~ 688.
- [41] Lin , M. and S. Viswanathan , 2015 , “Home Bias in Online Investments: An Empirical Study of an Online Crowdfunding Market” , *Management Science* , Vol. 62( 5) , 1393 ~ 1414.
- [42] Pascali , L. , 2016 , “Banks and Development: Jewish Communities in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and Current Economic Performance” ,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 Vol. 98( 1) , 140 ~ 158.
- [43] Pierce , L. and J. Snyder , 2017 , “The Historical Slave Trade and Firm Access to Finance in Africa” ,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 Vol. 31( 1) , 142 ~ 174.
- [44] Sarkissian , S. , and M. Schill , 2003 , “The Overseas Listing Decision: New Evidence of Proximity Preference” ,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 Vol. 17( 3) , 769 ~ 809.
- [45] Tabellini , G. , 2008 , “Presidential Address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 *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 Vol. 6( 2 – 3) , 255 ~ 294.
- [46] Tsai , K. , 2015 ,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tate Capitalism and Shadow Banking in China” , *HKUST IEMS Working Paper* , No. 2015 ~ 25.

## Cultural Diversity and Informal Finance: Empirical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ect

ZHANG Bo FAN Chenchen

(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d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Finance and Taxation ,Shando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Using the number and capital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inance in the macro – level and dialect diversity to measure culture diversi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ina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dialect diversity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effect on the number and capital of microcredit companies. The mechanism is that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social capital , which are represented by dialect , help to mitigate private lending transaction costs and default risks. We further use the performance of 438 microcredit companies in Shandong Province to measure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inance in micro – level and find that the dialect diversity reduces the profitability and loan size ,but increases the operating risks. This provides the micro foundation for the effects of cultural diversity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l finance in macro – level.

**Key words:** Cultural Diversity , Dialect , Informal Finance , Microcredit Companies

( 责任编辑: 林梦瑶) ( 校对: ZL)